

「美」 魏乐博·范丽珠 主编

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

〔美〕魏乐博 范丽珠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 / (美) 魏乐博, 范丽珠
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2810-1

I. ①江… II. ①魏…②范… III. ①宗教—华东地区—文集②社会生活—华东地区—文集 IV.
①B929.2-53②D66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767 号

责任编辑 张钰翰
封面设计 王小阳

江南地区的宗教与公共生活

[美] 魏乐博 范丽珠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3 字数 217,000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810-1/B·1104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	魏乐博(Robert Weller)	1
······	朱海滨	18
······	范丽珠 陈 纳 赵文词(Richard Madsen)	47
······	陶 金 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	86
······	屈啸宇	113
······	孙砚菲	153
······	吴科平	174
······	白 莉	203
······	曹南来	237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Religious and Social Change in Greater Jiangnan	Robert Weller	1
Worship of Water De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wer Bank of the Qiantang River: On Zhangxia Diety	Zhu Haibin	18
The Lost and Renewal of Cultural Heritage: Ethnographic Study on Lineage Traditions in Southern Wenzhou	Fan Lizhu, Chen Na & Richard Madsen	47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Suzhou	Tao Jin & Vincent Goossaert	86
A Boundary Ceremony for a Community Protection Temple and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Case of Baojie Activities in the Mid-Taizhou Villages	Qu Xiaoyu	113
The Three Tendencies of Popular Religion in Zhejiang: Case Study of Taojiang County in Southeast China	Sun Yanfei	153

Buddhism in the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cy, Orthodoxy and Moral Society in Southern Jiangsu	Wu Keping	174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A Study of Belief Space among Muslims in Yiwu	Bai Li	203
Local Business Elites and Civil Christian Charity	Cao Nanlai	237

导言：大江南地区的宗教与社会的变迁

魏乐博(Robert Weller)

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日益深入,更多新的社会空间不断释放,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这不仅体现在官方登记的宗教信徒数量的迅速增加,同样重要的还有宗教信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多样化。五大宗教传统在积极调整中不断成长;在体制外,其他形式的精神生活广泛存在,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何种宗教可能性?不同的宗教形式之间有什么相互关系?这些宗教影响力对中国未来的意义是什么?

研究的问题

自 2009 年起,我们的研究团队就开始试着去认识宗教的多样性与其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之间的联系,并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即广义上的大江南地区。大多数参与者都于 2010 年至 2011 年间进行了研究,这期间我们每年碰头一次,分享各自的研究发现。^①

以下三个较为宽泛的问题激发了我们彼此的思想碰撞:

^① 我们要感谢布兰得利基金会(the Bradley Foundation)和波士顿大学的文化、宗教与世界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n Culture, Religion and World Affairs)慷慨的资助和支持。复旦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场地,在此谨向其表示谢意。

其一,迅速发展的宗教如何通过公益活动以及创造新的社会纽带带来塑造公共生活?

其二,当前的变化模式与中国历史传统有何种关联?换言之,目前的局面在何种程度上可视为传统的复兴,在何种程度上展现的是全新东西?

其三,这些变化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何存在差异?中国变得日益城市化和多元化,这些变化又如何与之相协调?

第一个问题的核心是宗教建构社会纽带的能力。当然,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们从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问题^①。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社群有不同形式的社会影响力。这里讨论的案例不仅包括由多股社会纽带结成的强大的地方社区,也包括许多较为松散的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通常不是地域性的聚居区,而只是由于追随某一共同的教义或师父而聚集在一起。有些社群很容易和相邻的宗教社群建立沟通的桥梁,另一些社群则倾向于自我封闭。宽泛的层级体系会把一些社群彼此串联起来,还有的社群就是些更独立的小单元,另一些则是不同社交圈子的重合和叠加。在经验层面上,本书好几章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宗教信徒和邻居乃至陌生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是彼此沟通还是老死不相往来?

宗教在提供社会服务和救急救难方面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那么,在这一变化中,宗教群体的性质究竟为何?在过去,中国绝大多数的宗教和信仰组织都要人们向善,形成乐善好施的传统:在人们需要时提供道德指引和慰藉,为求学者、有需要的长者,或者那些受灾的难民提供具体的纾难帮助等。但以前这类纾难解困、扶助孤老以及提携有志者的举动,大多只针对本地宗教社区内的乡党与亲眷等,现在这种类型的援助重新恢复。中国社会的自助性服务的普遍增长,就是其中

^① 开创了这个领域的关键性文献,即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ans. Karen E. Fiel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1912].)。

的一例。

当然，普世性公益行动的快速的发展更引人注目：人们愿意用自己的时间、经验和金钱来帮助那些完全陌生而又需要帮助者。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和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前者是全球性的佛教慈善团体，后者则有基督教的背景^①。这两个团体作为公益行动的先行者，是大量这类组织中规模较大的，有不少类似团体规模较小且没有注册。本书多篇论文都探索了促使宗教信仰者乐于对一般人提供帮助的原因；研究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对普世性慈善事业感兴趣。根据这些研究的描述，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在这个过程中互相改变着。

第二个问题侧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及其与当前状况的关系。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有些过于简单，即：我们见到的究竟是旧宗教传统的复兴还是全新的创造呢？我们在讨论中认识到最初的问题有这么几个缺陷：首先，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宗教一直在不断变化。换言之，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复兴逻辑。对此，朱海滨的研究论述得尤其清楚。他介绍了祭拜潮神的各种庙宇和历史变迁；潮神崇拜的重要性主要是在江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就不一样。直到以张夏神为代表的潮神在宋代取代了早期潮神，它才变得重要起来。最后，宋明之间这类信仰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其他地方的宗教也是在不断适应生态、经济和政治条件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要描述这一传统不断流变、演进的历程“复兴”也许不是非常恰当的词。

本书中多个案例关注到在中国有悠久历史的宗教，其目前的存在状况并非是简单的“复兴”。白莉的研究表明，浙江义乌的伊斯兰教就与复兴毫不相关。今天在义乌出现的数量庞大的伊斯兰教信众

^① 参见魏乐博(Robert P. Weller):《中国的宗教仪式和公益》，收入高师宁、杨凤岗编：《从书斋到田野：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文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183页；以及C. Julia Huang,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Cheng Yen and the Buddhist Tzu Chi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群体,就是全新的现象(尽管她访问的大多数移民祖辈都是穆斯林)。基督教当然并不是今天才在中国出现,有些地方以前也并没有明显的基督教影响。因此,这也不是复兴的问题。

事实上,就算是看起来更像是复兴的案例也总是呈现出更复杂的适应过程,而不是“复兴”这一个词语能简单概括的,如浙江的庙宇和宗祠、苏州的道士、温州的基督徒或者遍布江南的佛教徒等。当代宗教的确延续了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出现了各种转化乃至这些传统的改变。外来宗教需要调适和改变自身,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信仰的发展状况实际上延续了中国宗教自身具备的灵活的适应性。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宗教中存在的复杂的差异性。一类差异性是由宗教传统所划分的。许多中国人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差不多,因为它们反正都劝人为善。一定程度上这种理解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不同宗教在神学和社会学上的显著差异是否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呢?例如,基督徒更愿意建立关系紧密的地方社区,而佛教徒的社会网络就很松散。

本书的研究表明,相比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来说,每一宗教传统内的差异可能更重要。本书考察的所有宗教传统(包括民间信仰)都会进行一些慈善活动,而且都会从教理的层面论证它们究竟应该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助人到什么程度,或是应该和理念不同的组织(包括国家)合作到哪种程度。这个问题在曹南来讨论温州基督徒的论文中体现的尤其清楚,也出现于本书探讨佛教徒和穆斯林的章节中,不同宗教的信众们也都关心自己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和宗教外的世界相妥协。

各种宗教发展出类型各异的社群。有的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如本书中涉及的浙南宗祠、台州的庙界、浙北的潮神;另有一些宗教运动在地方性组织的基础上,往往会发展出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如很多基督徒);有一些宗教内部则出现交叉的社交圈,如在义乌的伊斯兰教群体;另一些则组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性的网络(如慈济)。总之,不

同宗教传统内部的差异性也很明显，每一宗教传统都包括非常广泛的可能性。我们从曹南来的研究中，注意到即使是在基督教内部形成的社群，其特征也大不相同。

城市化水平是解释这种差异性的一个主要因素。江南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城市扩张特别快，大量移民从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纷纷涌入。以前城市里也有一种街坊邻居间的亲密互动，但随着单位制解体和住房私有化，这种邻里间的亲密关系也渐渐消失了。对此，本书多个章节都探讨了宗教群体的结构中存在的巨大城乡差异。

大江南地区

本书研究限定在广义的中国江南地区，来探讨宗教多样性。可能没有哪个区域能够声称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江南地区亦不例外。而我们以某一区域的研究来认识宗教的多样性，有助于缩小整体可能性的范围。其实对这一个地方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未来的工作还有很多。以后对其他区域展开类似的研究，乃至把范围扩展到全中国、全世界各种类型的华人社会，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本书中尚未囊括存在于江南社会生活的某些宗教形式，比如天主教徒和一小批东正教、巴哈伊教和犹太教的信徒。我们的研究团队人数有限，因此没有足够力量涵括江南地区所有重要的地域，比如我们目前缺乏对上海的情况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有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弥补这些不足。

为了能够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宗教形式，我们把“江南”定义得很宽泛。通常江南指的是长江下游以南的区域，尤其是苏南、上海、浙北。但我们研究的地域包括了狭义的江南地区最边缘的地方，如浙南温州的两个案例。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有几种宗教在这些边缘地区有着最明显典型的表现，像是温州的市场化基督教和最近复兴的宗祠。这些边缘地区和江南的核心区域结合在一道使我们认识到城乡之间存在着的广泛差异，这些差异涉及不同层次的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当然也涉及不同的宗教传统。

宋代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商业和教育中心;这部分得益于传统技术条件下江南便利的交通。在火车和汽车问世之前,水路运输的成本要比陆路运输低廉很多^①。江南河流和湖泊纵横,特别适合水运;且地方官员和民间几百年间在治水方面努力也卓有成效。因此,祭祀潮神的庙宇在江南很常见并不稀奇,朱海滨的论文便介绍了杭州和绍兴的张老相公庙。

朱海滨的文章提醒我们,宗教总是与一地区的生态、社会和政治的变迁过程交互作用。当某个地区成为王朝的都城时,会有机会发展成富庶之地,如南宋时的杭州和明朝早期的南京。由于经济繁荣,特定时期又具有政治中心的地位,江南成为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

佛教在江南的历史非常悠久,南北朝时江南地区便已成为主要的佛教中心,且直到现在还是佛教兴旺之地(见吴科平和孙砚非的文章)。江苏茅山是重要的道教中心,与江西境内龙虎山的正一道中心相去不远。道教的北方派和南方派在江南彼此交织,情况尤为复杂和有趣。屈啸宇的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道教全真派和正一派之间的互动。

今日的江南地区富庶繁荣,平均收入全国最高。与此同时,传统乡村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地方的村民搬进了新型公寓,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宗教生活的重新组织;有些地方的农村则为不断扩张的城市所吞噬。几乎对每个人来说,交通和通讯的迅速改善都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不仅如此,本地的经济机会还吸引了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移民。这些大大增加了江南地区社会和宗教的多样性。本书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涉及这些变化在宗教方面导致的影响。

本书的话题

本书各章的顺序大致是依照不同的宗教传统编排的。首先是与

^① 水路运输对中国之影响的一般讨论见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收入于 George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的文章。

超验世界相关的地方性的场所——庙宇和宗祠的研究；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道教、佛教和基督教。我们注意到，几乎每篇论文的背景中都会显现出民间信仰的重要性。所谓民间信仰，包括了一系列既没有名号而又纷繁复杂的习俗和观念；目前不被人们当成是宗教，以前甚至连“教”都不是，不过是弥漫在日常生活习惯的一部分罢了。历史上，这种普通人的信仰与佛教徒和道教徒（还有其他所有宗教的信徒）的关系都特别密切，因此本书讨论诸宗教的各篇论文会涉及民间信仰并不稀奇。基督教常常反对民间信仰的许多观念，但在更深的层面上二者也有紧密的联系。尽管曹南来收入本书的论文中对此未加探讨，但他研究的“老板基督徒”与农村庙宇的富裕资助人也很相似。

本书第一章是朱海滨关于潮神崇拜的文章。把它放在开篇是因为民间信仰对理解所有这些宗教传统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且这篇论文在历史的纬度上的挖掘最为深入。他提出了几个重要论点，希望大家在阅读全书时也应加以留意。其一，他指出生态和政治过程与地方庙宇相互影响，这个纬度对我们理解中国宗教的差异性很重要。这首先体现在江南的潮神崇拜因水而生，也因水而灭。在他的描述中，神明崇拜与本地生态系统中的良田灌溉、洪水突扰等都密切相连^①。神明、庙宇和信仰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本地的生态系统与政治资源亦不断改变着。他解释道，宋代以前潮神代表一种邪恶的力量，人们祭祀是希望免于灾害。宋代时，由于朝廷的支持和治水工程的进步，人们才开始对治潮有功的官员立祠崇拜，且影响力超过旧潮神。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宗教并不是对其他的因素消极地做出反应，相反，庙宇构成了治水管理体系的一部分。这种生态与政治互相调适的过程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宗教差异性十分重要。

朱海滨论文的第二个重要论点涉及持续的地方化过程。张老相

^① 另一个宗教与治水系统彼此交织的案例见 Kenneth Dean and Zhenman Zheng,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2 vols, Leiden: Brill, 2010。

公崇拜起源于杭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心便转移到了绍兴,大多数人也渐渐忘记了这个神最早来自杭州。朱海滨的文章还详细地考证了张老相公的传说不断改变的过程。随着供奉的地方越来越多,张老相公的故事也因地制宜地不断调整着。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解释中国宗教差异性的又一个过程。

范丽珠、陈纳和赵文词(Richard Madsen)的文章使我们注意到民间信仰的另一方面,即宗族传统在浙江南部扮演的角色。温州地区很多村庄都重修了当地宗祠,故本章特别关注应如何认识宗族:究竟应把它看作传统遗失还是文化复归呢?宗族传统表面上已经被破坏了,但本章以各种地方性资料表明它们基本是连续的,甚至“文革”中也没有完全消失。

温州宗族的一大变化是现在开放性更强。多个案例表明宗祠的功能更像同姓会而非传统宗族。孔氏宗祠提供了另一例子,它既是孔庙又是族人祠堂,既服务于孔氏,也开放给整个社区,这是传统宗族观念的一个显著变化。家族中女性后裔以前是不入族谱、不进祠堂的,重新恢复的宗族活动则为妇女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最后,从仪式的角度来说,今天的宗祠会请僧人或道士来做法事,而族人中的佛教与道教信徒和族亲一道参与各种宗族的仪式活动。信奉基督教的族人不会去祭拜祖先,但他们则会参与宗族相关的其他活动。

一些案例表明,复归的宗族(至少是族中领袖)甚至会通过慈善活动为整个地区公益服务。宗族以前凝聚的主要是基于血缘亲疏的亲族团体,不同的亲族团体之间只有非常松散的关系,现在宗族却成了连接不同人群之间的桥梁。本章把这一变化描述为从内聚性资本到外联性资本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宗族的面貌比以往更多元化^①。本章将这些复归和转化的宗教和社会制度看作是市民社会的另一种形式(alternate civil worlds),而不是与国家对抗。2006年苍南县在

^① 关于社会资本在创建和维持社会纽带方面的作用,见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政策上对宗祠仍然加以限制，但宗祠的多种功能使其有存在的空间，比如“老年协会”往往就设在宗祠里，老年人得以利用宗祠场地开展各种活动。

陶金和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讨论了苏州地区的道教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发展，以及这段历史如何影响了它与当地村庄庙观的关系。他们的一个主要结论是百年之后，道教虽然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大体上仍然保持了集体化的结构；这与范丽珠、陈纳和赵文词的论点相似。

本书很多章都讨论了城市和农村地区宗教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苏州道教而言，出了庙门就没什么公共仪式了；但在周边农村，有道士参加的绕境出巡仍然很重要。这里我们得出的一个推论就是，现在是道士去农村赴庙，而不是土地神巡游到道教的重要宫观。道教城乡之间的差异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而最近些年的发展变化也未改变这种状况。

与此相关的变化是，苏州道教以前统一的师徒结构已不复存在了，道士也不再拥有在特定区域内从事活动的专有权。结果是当地道观现在可以自由聘请任何道士，这就促进道教内部产生了更多的差异性。陶金和高万桑还指出，道教的状况在苏州市下辖的几个县级市之间也不尽相同，这主要取决于当地道教协会对道教宫观控制的程度。

当然，本章与前一章中温州宗族的讨论背景不太一样，但陶金和高万桑也认识到女性在道教活动中现在发挥着使人惊讶的作用。香头是道士和本地庙观之间的主要媒介，1950年以前只有男性才做香头，但现在担任此职的几乎全是女性，而且她们还担任被当地称作“仙娘”的灵媒。

屈啸宇的文章讨论了与重建保界相关的问题，以及保界与道士群体、还有当地称之为“先生”的更像儒家的专家群体间的关系。像我们已经在苏州的案例中看到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保界体系和特定道士家族的成员关系密切，这种状况在1950年代时中断了。但是，

记载道士及其仪式文本仍然在民间悄然存在着,而且一直流传到了社会更加开放的 1980 年代。屈啸宇描述了当地居民、政府、道教协会(当地由全真派掌控)、本地的火居道士和先生们还有其他的宗教人士之间十分复杂的互动,而正是这一复杂的互动过程导向了保界体系的复兴。

与本书中其他的案例一样,保界体系的复兴并不是对旧体系简单的重现,其中的变化太大了:老道士家族的成员丧失了他们控制仪式市场的能力(像高万桑和陶金描述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村落空间与村落社会之间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当然,旧的文本、宗教专家的影响和专业技能仍然在重建此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形式有所不同,有时甚至出现了与道教协会及当地政府对立的情形。

屈啸宇把重建保界称之为“社会空间创造性的再生”。台州人可以选择的宗教可能性多种多样,包括基督教、新兴佛教等。与高万桑和陶金一样,屈啸宇表明这种社区的庙宇生活仍然是人们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组织本地保界活动的领袖很多都已经上了年纪,因此从长期看来,当地的宗教结构仍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孙砚菲的研究讨论了佛教与民间庙宇的关系。她在浙江北部地区观察到民间庙宇重建后导致宗教呈现的三大趋势:其一是佛教化,约有 20% 的当地庙宇与佛教有正式的关系;其二是女性化,即庙宇重组之后,领头人多是女性,这与早先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其三是两极分化,一部分庙宇发展势头特别好,另一些则门庭冷落。有些庙在 1990 年代重建时人们热情还很高,后来渐渐又寂寞了。

她还注意到农村和城市宗教出现的一个显著差别,即有些以庙宇为中心的团体和仪式在农村重建了,而在城市里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与陶金和高万桑对道教的研究一致,我们也在其他章中见到类似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江南的城市里面没有宗教,而是说其组织方式不再是地区性的庙宇了。

孙砚菲分析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导致了宗教制度层面的

变化。五六十年代农村基层的重新组织和 1980 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联合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因而削弱了民间宗教的社区纽带。她认为，尽管大的集体宗教活动和庙宇仍然存在，但个人化和自愿性面向的重要性已超过了社区层面。妇女以往就一直和更个人化的面向结合在一起，而男性以前又一直主导着社区的活动。这也是今天佛教特别吸引女性的方面。

吴科平与孙砚菲讨论了江南不同的地方，主题却相通，尤其是近来宗教多元化、女性化和佛教化的趋势。吴科平描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寻找的宗教变化^①，在她之后的那几章也描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众中从自然性到自觉性的变化。换言之，过去人们对某些宗教观念习以为常，把它们当成是日常生活理所当然的部分，现在却开始积极思考成为佛教徒的意义，而且向僧团寻求正法。她表示，无论是僧团内部还是俗家弟子，对于何为正法、正信，看法各异，这导致苏南佛教界十分多元化，对宗教的意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具有多重的意涵。她在论文中也提到，这种佛教多元化的趋势也与城市化进程削弱了旧有的社会纽带有关。

吴科平描述的佛教徒自觉化的过程涉及道德生活的问题。这个问题促使佛教徒进一步思考佛教对道德的影响，如放生活动。但更多活动涉及一般的慈善行为，这和其他的宗教传统对道德的思考也很相似。女性是这个群体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慈济功德会的女信众（慈济在中国大陆的本部位于苏州，但此规律也适用于江南本土发育的团体）。^②

最后，吴科平的那一章解释了江南佛教徒如何致力于维持追求

^① 吴科平的观点受到伍斯诺区分“栖居”(dwelling)和“寻求”(seeking)的启发，见 Robert Wuthnow, *The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n Religion: Society and Faith Since World War I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其他文章则引用的是另外的文献。

^② 关于慈济对性别和道德关怀的结合，见 Chien-Yu Julia Huang and Robert P. Weller, "Merit And Mothering: Women and Social Welfare in Taiwanese Buddh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no. 02 (1998), pp. 379 - 396。